

百年文潮丛书

百年

自由者梦寻

zi you zhe  
men g xun

“现代评论派”  
综论

文 潮

倪邦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袁银昌

**自由者梦寻**

**——“现代评论派”综论**

倪邦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3 字数 174,00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7,000 册

ISBN 7-5321-1630-1/I·1323 定价：13.60 元



第一頁

当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  
社会文化思潮时，都无法回避这  
样一个事实：文化的魅力是永恒  
的，而坚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  
寻求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启蒙  
主义思潮，则完整于二十世纪思  
想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五四  
新文化运动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推  
向了寻求自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完全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  
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所预  
示的传承与变革的主题留给后人  
不断的反思与咀嚼。

作者手迹

倪振文

## 序

林 非

邦文拿着他自己的毕业论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的打印稿，兴冲冲地赶到我家里，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来信告知他，将要安排这部书稿付梓，所以他要我撰写一篇带有评论性质的序言。当不少刚毕业的博士生正担心论文难于出版的时候，这真可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自然得十分认真地写出这篇序言来，作为一种出自内心的祝贺。

回想两年前的初夏，我在仔仔细细地阅读这篇论文时，就觉得邦文写得相当的出色，既勾勒了《现代评论》这个文化团体组成的来龙去脉，又分析了他们的思想面貌和发展情况，作出了科学而全面的评价。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左”倾思潮的长期影响下，许多有关的著作都已经给这个团体戴上了一顶“反动”的帽子，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是不得不然的。当历史进入新时期的阶段，随着政治和学术评价的尺度的逐渐趋于宽容和合理，就有可能对此作出科学的探讨了。近年来确实也曾出现平心静气地论述“现代评论派”的文章，然而在数量上来说是甚为稀少，从内容上来说

则是分析不深。邦文经过孜孜不倦地勤奋治学，在广泛地收集材料和爬罗剔抉加以梳理的基础上，对“现代评论派”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了相当科学和公允的结论。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极大地推动了对于“现代评论派”的研究，无疑也是这个领域中十分值得注意的新收获。我在读完以后实在是充满了一种难于形容的喜悦，深感年轻一代的学子在多么迅速和茁壮地成长着，学术界真是后继有人啊。

记得在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过程中，参加答辩委员会的几位著名学者一致地肯定和赞扬了它，认为它对“现代评论派”的文化心态、思想追求和政治倾向等等方面，都作出了充满独创性的全面分析，颇具历史和理论的深度，而且还从当今的时代高度总结它正负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听到了这些意见以后，我更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自己作为邦文的导师，总算是还没有误人子弟。

我觉得邦文这部论著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具有扎实的根底和广博的学识。他评价“现代评论派”的根本出发点，就是牢牢地抓住中国和西方这两部文化史，概括地阐述它们如何走向现代的过程。在 13 世纪以后，西方逐步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在稍后于此的中国大地上，明朝中晚期以后的儒家异端学派，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人性解放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前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后者却遭遇了种种困难，于是只能渐渐地落后下来。20 世纪初所掀起的五四运动，就是由当时的一批先驱者提出要学习西方种种先进的经验，又一次悲壮地发动了向现代化的冲刺。“现代评论派”实际上是想要继承

“五四”的目标，完成通向现代化的事业，可是他们又碰上了形势突变的时代，他们的心态和作为，不由得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同初衷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五四”文化运动中经历了大分化的一批先驱者，又投入了社会和政治的革命运动，他们以及他们所团结的一批文化人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形成了很重要的支配力量，致使不断受到他们批评和指责的“现代评论派”只好又一次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正是在书中这些充满说服力的夹叙夹议中间，清晰地显示了邦文全方位的历史感，以及分析的能力和文字的修养。

邦文对于“现代评论派”作为一种历史角色所进行的心理分析，可以说是书中十分精彩的片断。这个团体中的成员大多出身于带着封建主义色彩的家庭，接受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影响，然后又负笈海外，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坚定了自己追求现代化前景的意愿。这样的两种思想和精神倾向，时刻纠缠着他们的心灵，产生了紧张和剧烈的矛盾。他们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缝隙里，使得自己处于两难的窘境，追求独立个性的学术自由与“学而优则仕”的走上仕途这两者的矛盾，是所有矛盾中最为尖锐的核心问题。

当然，他们主要的思想倾向，还是企图追求内心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宣扬现代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法治思想。总的来说，他们的主张是有利干推动历史的前进，尤其是有利干现代文化的建设的。然而这些珍贵的见解，往往被他们自己有时依附于国民党统治当局的色彩所掩盖，冲淡了进步的内容。在当时那种小农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土壤上，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还处于封建主义意识的沉重束缚中，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专制主义严酷控制，他们这些进步的思想倾向必然

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状况、传统文化面貌和专制政治统治这三种原因，以及它们所融合而成的许多复杂影响，使得“现代评论派”所做的全部工作并未获得应有的成功，没有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邦文的分析和论证是令人信服的，我至今还记得那几位著名学者为此而发出的称赞。

尽管“现代评论派”在当时处于这样的情况，却依旧受到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五四”先驱者的批判。这些从“五四”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以更多的精力思考社会政治革命的知识分子，当然会敏锐地看出他们向国民党当局献媚，和逐步投靠这个反动政权的嘴脸，向他们开火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充满了正义感的。然而这种做法只是抓住他们的一个侧面，却没有顾及继承“五四”启蒙主义，和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侧面，而这曾是那些先驱者在不久以前倾其全力所进行的伟大事业。为什么这些先驱者会忘记掉自己辉煌的来路呢？是不是因为“现代评论派”表现出了投靠国民党当局的倾向，就不管甚或抹煞其存在着合理因素的另一侧面呢？如果是做得更为合理与科学的话，应该是批判其错误或反动的一面，肯定其准确和有益的一面。在 30 年代的思想文化斗争中，有些左翼作家对于“第三种人”的论战，就是在批判中也有所肯定的，这样的做法不仅对社会政治斗争有利，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同盟军，而且也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可以积累更多优秀的成果。回顾这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真可以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沉思。

正是因为在社会政治斗争中没有时刻想到团结更多的友军，而往往是采取无情和残酷的打击的做法，这样就无法取得更大的成功；正是因为在思想文化建设中不能容纳更多的精

华，而常常是狭隘和无知地加以排斥，这样就不可能很好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从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说，尽管邦文探讨的是“现代评论派”这个不算很大的话题，却无疑也可以引起我们深长的思索，邦文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完整分析，正好是可以推动和启发我们更好地获得应有的结论。

邦文在论述“现代评论派”无法取得成功的三个重要原因时，提及了几年前流行过的“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论调，认为此种说法是不科学的，无法用它来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进程。他还具体地分析了“现代评论派”的不能取得成功，并非由于它“启蒙”的意义被当时的“救亡”所压倒的缘故，而正是由于他所举出的那些原因。这实在是论述得相当有说服力。看来，真正想要切切实实地治学，就应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得出自己应有的结论，推动学术研究的向前迈进，而千万不要迷信和盲从某些哗众取宠和毫无道理的流行说法。这正是邦文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得在邦文即将毕业以前，好几位正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博士生都跟我谈起过这个曾经流行的论调，表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也曾跟他们充分地交换了意见，认为笼统地将包括所有社会政治斗争在内的所谓“救亡”，都说成会“压倒”从事思想文化建设的所谓“启蒙”，这绝对不是从全部历史进程中所得出的科学抽象，而不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随意性的臆说罢了。对于一个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的政党或个人来说，在从事“启蒙”的时候，绝对不应该忘掉“救亡”的重任；反过来也是一样，在从事“救亡”的时候，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启蒙”的这个重任。对于成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来说，“救

亡”和“启蒙”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而如果只抓住其中的一端，那就肯定会造成长久的失误。举现代史上的例子来说，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自然是革命的盛事；至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这就更是保卫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之举。然而，如果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或以后，不去进行思想文化的建设，那么国家依旧不可能强盛和文明起来。这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深长思之的。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互相制约与反馈的，应该全面地认识并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促使发生良性的循环，而如果只抓住一点，却不及其余，那就可能会发生恶性的循环。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存在的片面性，因为还没有产生行动的效应，那是较容易纠正的；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因为他可以指挥重大的行动，发生错误以后将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严重的灾难。所以，对后者，不能不充分地引起注意和惊觉。这离开邦文关于“现代评论派”的探讨，似乎多少显得有点儿遥远了，然而这是涉及治学风气的一个重要和关键的问题，邦文又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建树，因此我的说明大概不能算是多余的。

邦文这种高屋建瓴和视野开阔的治学风度，再加上细致和透辟的分析能力，始终贯彻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间，因而就使这部《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很值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为了鼓舞他向更高的目标冲刺，我在这里再一次很郑重地向他表示祝贺，衷心地期望他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6年6月1日于北京安贞桥边

# 目 录

序 .....	林 非
<b>导言</b> .....	1
<b>第一章 “现代评论派”的团体构成</b> .....	11
一 关于“现代评论派” .....	11
二 《太平洋》同创造社的联手 .....	14
三 《努力周报》和新月社以外的团体 .....	22
四 欧美派群体 .....	31
五 兼容并包——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派别 .....	38
<b>第二章 西式的文化精神</b> .....	43
一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重要的精神纽带 .....	44
二 近代英美的思想渊源 .....	50
三 异域土壤培植的自由观 .....	59
<b>第三章 传统大厦的摧毁</b>	
——反传统的态度 .....	67
一 明清之际的异端之声 .....	68
二 晚清的慌忙择路 .....	73
三 “五四”的疾风暴雨 .....	76
四 汇入时代潮流 .....	85

<b>第四章 理性殿堂的建构</b>	
——文化主义之路 .....	94
一 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 .....	95
二 法律的意志 .....	101
三 有节制的革命和爱国运动 .....	108
四 理想的文化之境 .....	115
<b>第五章 现代绅士的窘境</b>	
——文化心态探析 .....	129
一 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夹缝中 .....	130
二 “士大夫”的理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 .....	145
三 战火纷飞与坚守文化圣地的两难 .....	157
<b>第六章 独树一帜的文学态度(一)</b>	
——自由主义的文艺思想 .....	167
一 以人为本的文学视角 .....	168
二 道德启发民智 .....	176
三 重“心灵抒发”的艺术主张 .....	187
四 宽容的批评原则 .....	192
<b>第七章 独树一帜的文学态度(二)</b>	
——“现代评论派”的创作特色 .....	198
一 关注社会的现实态度 .....	198
二 自然与人的自由 .....	206
三 自我的寻思:独立人格 .....	210
四 隐喻和象征:至善至美之境消失的忧虑 .....	215
<b>第八章 淹没不了的历史足迹</b>	
——“现代评论派”的历史及现实文化意义 .....	221
一 命题的合理性 .....	221

二 承接和后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 .....	227
三 失败原因的探寻 .....	235
四 现实的启示 .....	245
后记 .....	251

## 导　　言

当我们面对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潮时，我们都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的魅力是永恒的，而坚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寻求社会发展和民族出路的启蒙主义思潮，则是整个 20 世纪思想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如果说辛亥革命揭开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序幕，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把 20 世纪的中国推向了寻求自我出路的第一个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所揭示的传统与变革的主题留给后人以不断的反思与咀嚼。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部分构成。经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基础领域，它是一种以物质生产及其管理为特征的自律体系。政治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一种国家机器的运转体系，是一个包括法律和行政的理性机构。文化则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第三领域，其中的思想道德、信仰原则及价值形态，维系了历史同现实的交接和更替，它以更显丰富而有意味的形式记载着传统与现实的沿革。中国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不断地从这三个方

面探索自己的出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好完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循环。洋务运动注重于经济意义上的科技层面的革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着重于政治制度的改良和革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从民族文化的反思及求新上来思考中国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命运，这个层层递进的循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更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启示意义。

令人深思的是，五四运动本身又引发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倾向，即坚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不同角度的革命，它们分别以科学救国、暴力革命和自由主义的文化启蒙为代表。“科学救国论”曾经风行一时，但很快就消失于社会革命的潮流中，而启蒙思潮则一直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运动而同社会革命相伴而行，成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交响曲中的一个“副部主题”。本书所涉及的对象——“现代评论派”，是一个坚持以文化启蒙为核心而寻求社会变革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文化派别。

“现代评论派”是围绕着《现代评论》周刊而出现的一个颇具思想复杂性的政治文化派别。《现代评论》创刊于 1924 年 12 月，终刊于 1928 年 12 月，历经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军阀统治的社会变迁。事实上，它的主要成员的思想和主要社会活动远不限于这四年，它可上溯到 20 世纪初，下延到 30、40 年代乃至更晚。他们的主要成员大多于 20 世纪初留学于欧美，回国后大多集中于北京大学。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带有较强的西化价值倾向。他们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学、哲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对现代中国的文化进步及

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并具深远的历史意义。若要研究 20 世纪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的文化思潮,就不得不涉及这批欧美派知识分子。“现代评论派”最为集中、典型地代表了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因此,我希望以它为蓝本,通过它来剖析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文学及政治态度,以观照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及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

## 二

作为 20 世纪初留学于欧美的知识分子,“现代评论派”深受英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美国民主思潮的影响,他们坚守文化阵地,反对激烈的革命,追求价值观念的变革,关注启蒙的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为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服务社会人类为己任,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企图独立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而坚持以公正、客观的文化态度,追求自己的理想价值和理想的社会文化形态,弹奏出了一组自由者的旋律。

自由主义是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主张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自主自立,对权威可采取批判的、独立的、理性的批评探讨态度,希望建立自由的政治、立法制度等。这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思想,不同于流俗所称的“自由派”。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初由欧美移植到了中国,从而在中国演出了一幕坎坷的悲剧。

“五四”从精神深处震醒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很多,但他们认为中心问题只有一个,

即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sup>①</sup>。欧美派知识分子，标榜着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从欧美回到中国；从近代的产业社会回到传统的农耕社会，企图以西化的价值观念来重建中国文化，然而传统文化的承袭性和包容性以及现实的民族矛盾冲击着理性的思想火花和价值观念。作为中国人，他们当时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割据，不可能不产生感时忧国、救亡图存的情绪。然而，他们又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站在人类一分子的高度来感受当时的世界文明的，他们有感于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一环，因此，他们并不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认识整个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他们在思想上自觉地向近代西方文明看齐，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因素，希望以自由主义的思想重振文化道德秩序。

“现代评论派”追寻文化功能的独立性。文化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它本身也是独立的自律体系，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运行功能，所以文化也是本位，也是主体。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确认文化自身的意义，要求文化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文化既可参与现实，又可超越现实。以超越的态度来探求真理、观照现实，是文化本身的目的。传统的文化功能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同“文以载道”的传统一脉相承，着重于以政治为本位，以文化为手段，以实现“道统”为最终目的。“现代评论派”则一反传统的文化功能观，企图以文化为本位，以政治为手段，建立独立的人格和人的主体意识，以实现文化

---

<sup>①</sup>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第151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价值的多元化。

为了实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他们倡导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他们以理性的态度追求民主、科学、法治等人文环境，主张有节制地进行文化秩序和道德形态的革新，建立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等文化形态，以增强文化本身的内涵。

深受民主和科学熏陶的知识分子，非常了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真实含义，所以他们反对强权，反对专制，追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结束了晚清以来科技不分的传统。科学，不仅仅是一套“技术”，而且是一套思想方法。因此，他们从价值观念上来强调科学和民主的意义，呼唤对科学和民主的尊重。《现代评论》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科学”的文章，从宇宙观、生命论到基本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并不是罗列一般的科学知识，而是介绍科学的思想方法。杨幼炯在《民众思想与社会科学》中指出，中国虽名为“中华民国”，实则未脱离“天地君亲师”的宗法制思想。他认为，造成民众思想麻木的主要原因是物质的压迫与生活的恐慌，大多数民众委之于天命，这是小农经济向现代社会转折的主要障碍。而“要推翻一般民众的宗法思想，只有科学”<sup>①</sup>。可见，他们已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的意义了。

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现代评论派”深感传统文化对人的压迫，强权专制对人的摧残，偶像传统对人的束缚，因此追求人的解放。这种“解放”，包含了自由、平等和人权等内容。这是一种新的文化内涵。他们寄希望于文明批评和社会

---

<sup>①</sup> 《现代评论》第3卷第63期。